鲁迅《阿 Q 正传》和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中的创伤书写——以创伤书写的三重路径为中心

刘婉明　潘泳雯

摘要：创伤书写不仅是文学意义上对创伤内容的再现，更是文化意义上对创伤经验的反映、反思和建构，成为现代文学中表现个体困境和时代精神危机的重要叙事方式。鲁迅《阿 Q 正传》和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这两部作品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但都以个体生命经历为切入点，通过书写身体创伤、精神幻想以及自我救赎的过程，展现个人命运与社会现实、时代思潮与民族记忆之间的深层联系。本文以创伤书写理论为研究视角，从创伤内容建构、创伤表达方法以及创伤话语生成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共同探讨苦难书写中的个体经验与社会精神困境之间的互动交流。

关键词：《阿 Q 正传》；《个人的体验》；创伤书写；三重路径

Trauma Writing in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Kenzaburōe's *A Personal Matter*: Centered on the Threefold Paths of Trauma Writing

Liu Wanming, Pan Yongwen

Abstract: Trauma writing is not merely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raumatic content, but also the reflection, introsp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raumatic experience in a cultural sense, becoming an important narrative mode in modern literature for expressing individual predicaments and the spiritual crises of the times. Although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nd Kenzaburō Ōe's *A Personal Matter* emerged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both take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s as their point of entry and, through writing about physical trauma, spiritual fantasy, and the process of self-redemption, reveal the deep connections between personal fate and social reality,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currents of the times and national memory. Taking trauma writing theory as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ducts its analysis from three levels—the construction of traumatic content, the methods of traumatic express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traumatic discourse—jointl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exchange betwee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spiritual predicaments in the writing of suffering.

Keywor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 Personal Matter*; trauma writing; threefold paths

绪论

创伤作为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始终与人类的历史记忆、社会变迁以及个体体验紧密相关。文学中的创伤书写，是作家们通过个体生命的经历以及对社会的观察进一步揭示社会现状、文化心理以及民族记忆的过程。鲁迅和大江健三郎分别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日本战后社会为背景，将处于创伤中的个体作为观察的切口，通过对身体伤痛、精神困境以及后续重大抉择的描写，展现出个体生命与历史命运之间的深层关联。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阿 Q 正传》与《个人的体验》的研究多集中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的探讨以及作家创作理念等方面，也鲜少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关于《阿 Q 正传》的研究，早期多集中于阿 Q 形象塑造以及其典型意义，随着视角的拓展，学界开始从历史、身体、叙事等层面对文本进行重新阐释。汪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他重新分析精神与身体经验之间的关系，指出精神胜利法是基于身体失败以及现实压迫基础之上产生的。此外，竹内好等日本研究者从鲁迅精神和文学结构角度出发，探讨鲁迅文学中“反抗绝望”的精神特质。对于《个人的体验》，国内研究大多关注大江作品当中体现出的存在主义和自我救赎思想，日本学界大多结合大江自身经历，将小说置于日本战后文学和原爆记忆背景下考察，尤其重视大江作品中“共生”思想以及人道主义思想。

近年来，随着创伤理论在研究领域发展，“创伤书写”这一视角可以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考察，不仅能理解两位优秀作家文学精神的共鸣之处，还能进一步揭示二者在表现苦难、反思现实以及探寻救赎的道路上文学价值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以创伤书写的三重路径展开分析，尝试探讨鲁迅与大江健三郎通过创伤书写实现文学精神超越的表现。首先，从创伤的反映层面入手，考察两部作品中展现出的身体创伤与精神异化的生命困境，并进一步揭露出隐藏于个体创伤后的时代伤痛；其次，从创伤作为文学表现方法角度出发，分析鲁迅与大江在叙事语言与创作方式上的异同，探讨反讽、自传等表现方法对创伤体验的强化；最后，从创伤话语生成的层面进行总结，探讨其构建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体系与个体再生的人道主义体系。

通过对《阿 Q 正传》和《个人的体验》的对比研究，理解鲁迅和大江健三郎所阐述的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二者跨越时代与地域所形成的文学对话，共同体现了现代文学面对苦难、反思现实并以此寻找未来希望的精神追求。

一、创伤的反映：创伤的内容建构与经验转化

创伤书写的第一重路径——反映论，以个体层面的创伤和时代层面的集体伤痛为主要内容，拆解鲁迅《阿 Q 正传》与大江《个人的体验》对创伤内容的构建层次，反映出个人命运与时代苦难的微观缩影。

（一）个体层面的创伤：肉体磨难与精神异化

鲁迅《阿 Q 正传》与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中的创伤书写都从身体着手进而发展到精神异化的层面。《阿 Q 正传》反映的是底层民众生存暴力所带来的肉身屈辱和麻木愚昧的精神劣根；《个人的体验》反映的是身体残疾、肉身老化带来的精神崩溃，从而隐喻日本战后民众内心境况。

在《阿 Q 正传》中，主人公阿 Q 因为身份地位低、言语攻击他人等原因饱受皮肉之苦。“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阿 Q 在形式上

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①]，他一开始面对的是比他身份地位高的人，所以他用言语自我安慰，从而“反败为胜”。但是后来遇到了在他认知当中的“异端”，他内心所构筑的理想世界受到冲击，所以他在精神上感觉“受到屈辱”，从而由身体创伤发展到精神创伤。汪晖指出“阿 Q 的失败感首先来自打不过别人，甚至打不过他所瞧不起的王胡和小 D，其次来源于他所身受的饥饿、寒冷和无法满足的性欲，最终来源于身体的死亡”[②]，肉身的失败是一切精神病态的源头。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体”观念对建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政治秩序是用来规训人个体本能的，对身体感觉的规训也成为传统秩序枷锁当中的重要一环，但过度规训则会成为阿 Q 丧失最基础痛感的样子。阿 Q 在肉体上受到伤害后第一时间并不是感到肉体生理上的疼痛，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的屈辱，他用“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后努力恢复身体的痛感，但似乎却是失败的，这里可以看出封建传统对他荼毒过深，让他失去了身体上的感觉，用“精神胜利法”逃避遗忘的方式填补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落差，沉浸在精神层面而缺乏基本的生理欲望。当欲望被压制、精神思想被驯服，阿 Q 就像是鲁迅映射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影子，能捕捉到精神屈辱但却感受不到最基本的生理层面的感觉，忘记千年封建礼教带来的痛苦和屈辱。

《个人的体验》当中，体现在身体上的创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刚出生的残疾儿，一个是残疾婴儿给鸟带来的长期负重导致的身体性能的衰退。鸟在一开始得知生下“残疾儿”时，他的身体出现了明显的衰老症状，“四十岁！鸟的胃部受到强烈冲击，打了一个嗝。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子，鸟，只具有四十岁的人的握力和拉力”[③]，周遭少年的嘲弄与欺凌构成了显性的暴力，而生活压力的堆积弥漫的窒息感则不仅造成了生理层面的损耗，更导致了其精神上的枯竭。长期欲望的压抑也造成了他性格精神上的创伤，鸟在逃离到火见子居所的那段时间里，“鸟记起了自己整日整夜沉醉不醒的感觉：火烧火燎的脑袋、干得冒烟的喉咙、疼痛的胃、沉重的身体、失去知觉的手指、酒精麻痹的大脑，那一连数周闭锁在威士忌屏障里的地窖生活”[④]，其中性意象没有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反而呈现出虚弱无力的性创伤、受损的肉体与生命力，充满死亡色彩。他变得麻木不仁、神经敏感，长期酗酒封闭自我，对外部社会新闻丧失感受和共情能力，借精神逃避消解创伤。

《阿 Q 正传》和《个人的体验》都以肉体创伤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人物的精神困境。阿 Q 在封建礼教长期规训下钝化生理感知，以精神胜利法麻痹失败，是中国底层民众的缩影；鸟在战后生存重压与家庭悲剧双重束缚下采用性与酒精麻痹神经，映射出二战后日本国民普遍恶精神颓废。虽然阿 Q 和鸟在面对创伤时采取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身体创伤与精神扭曲相互映照，这并非“个人的体验”，其背后潜藏着属于时代和历史的集体伤痛。

（二）时代历史中的创伤：民族畸形的镜像象征

无论是阿 Q 还是鸟，他们都是时代裂变下产

① 鲁迅：《阿 Q 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13—518 页。

② 汪晖：《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 年第 3 期。

③〔日〕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王中忱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年，第 12—13 页。

④ 同上书，第 111 页。

生出来的“畸形儿”。阿Q是游荡在秩序之外的幽灵，本能欲望被规训被压制，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鸟是一个挣扎在现实与理想边缘的迷茫者和绝望者，是内心欲望的“火山式喷发”与家庭、社会责任的双重压制所导致的结果。

《阿Q正传》中鲁迅以典型的底层农民阿Q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普遍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周作人早期评论精准点明其特质：“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①] 阿Q是一类人的代表，不能用现实当中的人来比喻，但却活在每个人心中，像幽灵一样影响着人们，是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系统当中不愿意接纳又不能去除的观念和本能。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底层人民被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精神奴役所残存的病根，也照出了民生百态。日本学者丸尾常喜曾提出“阿Q=阿鬼”的解读，这也指出了阿Q无话语权、无生存空间、不被正史记录的幽灵形态，寓意着封建等级如鬼魂般渗透入国人灵魂中，持续制造群体创伤。作为时代创伤的镜像，阿Q这一幽灵形象照见了底层民众千年封建压迫奴役下遗留的病根，鲁迅不仅想要揭露批判这种时代之痛，更想唤醒更多的民众，最终指向民族精神的革新和复兴。

《个人的体验》以“鸟”象征战后日本遭受多重战争摧残导致身心受损的现代人。鸟和这类人都有个特征：消极地接受创伤，从而停止生长。在书中，“鸟”遭遇了三次战争创伤，分别是二战战败创伤，朝鲜战争创伤与核战争创伤，这作为隐藏的创作背景预示了整个国家遭受战争暴力后的集体命运。二战战败后，整个日本社会笼罩在阴郁颓废的集体氛围当中，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成为日本民众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个人的体验》是大江在儿子出生后的自我写照，也是日本普遍精神症候的集体投射，文本中也提及“不过，在个人的体验之中，一个人渐渐地深入进他体验的洞穴，最终也一定会走到能够展望人类普遍真实的出口。”[②]“畸形的婴儿”是被原子弹打击过的日本的隐喻。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就投射了战后日本民族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即颓废、懦弱，无能不自信。面对广岛原爆的受害者，大江同样传达出与面对残疾儿子同样的态度，因此其产生的作品《个人的体验》势必承载起超越个体命运、从而具有普遍价值的时代责任。

总体来说，阿Q和鸟都是那个时代的镜像，阿Q所背负的是千年礼教的奴役之痛，鸟面对的是现代战争的刻骨记忆，但他们都是时代裂变催生出的畸形儿，以个体肉身和精神的苦难映照出难以磨灭的民族伤痛。

二、作为方法的“创伤”：创伤书写的文化呈现手段

杰弗瑞·亚历山大：“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创伤书写的第二重路径——方法论，将创伤作为作家书写苦难反思现状的文学工具，从叙事语言、叙事模式的维度剖析鲁迅和大江健三郎创伤书写的创作逻辑与文化表达。

（一）反讽与自传的双重经验

鲁迅与大江健三郎依托不同的文化记忆，形成了反讽启蒙与自传自省的创伤书写经验。

鲁迅在《阿Q正传》中最擅长运用亦庄亦谐

①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第1版。

②〔日〕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王中忱译，第135—136页。

的叙事语言，以戏谑的笔调塑造出了阿 Q 这一喜剧面孔下的典型悲剧人物，以轻松滑稽的叙事方式揭开近现代中国沉重冷峻的话题。反讽的笔法是鲁迅在《阿 Q 正传》当中最核心的创伤表达方式，其中最主要的表现集中在阿 Q 精神幻想与现实境遇之间存在的错位冲突：肉体不断遭受攻击、饥寒等创伤，现实情况一片狼藉、毫无尊严，但阿 Q 却总是依靠精神上的自我欺骗构建出胜利的假象，在精神世界中自给自足，这种现实与幻想之间存在的落差形成持续的文本张力，将底层民众现实创伤更直观地呈现在文本之中。阿 Q 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鄙夷弱小畏惧强权，内心渴望获得尊严却又自轻自贱，期盼革命改变自身处境却又不懂何为革命以及为何革命。矛盾的性格特质通过反讽笔法放大，他所受到的创伤层层递进直击人心，也让承载在文本叙事当中的文化创伤与国民性批判更具力量。

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则以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城市——广岛为背景，通过自传式书写呈现深陷创伤、挣扎沉沦到自我救赎的全过程，同时也构建起由私人苦痛通向民族文化创伤的通道。瑞典皇家文学院在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人生的悖谬、无可逃避的责任以及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那里获得的所有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①] 大江健三郎从自己家庭的遭遇中走出，不断对照广岛原爆幸存者的遭遇，再次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所应有的公共使命。因此，他决定用某个生活的模特来揭示生命存在的普遍境遇，开始以个体创伤反映普世体验，思考“共生”与“再生”的意义。在自传性质的书写中，个体创伤是载体，文化创伤才是主题升华的核心。鸟麻木、酗酒、逃避、感觉衰弱，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父亲的崩溃，更是民族苦难记忆的放大，让个体幽微的伤痛成为日本战后创伤的切口，共同探讨生存困境的出口。

综上而言，鲁迅和大江都将创伤作为文学反思的载体，由个体创伤向内深挖、向外延伸，抵达人类共通的灾难记忆，在直面苦难的过程中探寻民族与个体“共生”“再生”的救赎出路。

（二）共通的叙事内核：“向下超越”模式的体现

所谓“向下超越”，是指眼光向下、向内、向着自身以克服危机、开辟新的生路的尝试，将目光投向底层生存现实，直面苦难、向内自省的方式寻找突破创伤束缚、开辟精神新生的方法。这种以看似矛盾的向下、向内的方式来探索超越的契机，始终保持着与“大地”和“生命”的对话关系，向着身体和本能的世界深入，成为把握不同于被社会历史所压抑的现实世界谱系的唯一可能。这也是鲁迅和大江创伤书写中共通的创作逻辑。

鲁迅将阿 Q 最基础的生理感知作为“向下超越”的叙事起点：“有一日很温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阿 Q 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②] 饥寒冷暖的肉身体验标志着精神胜利法的失效，传统文化秩序集体失序，是每个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映。该时代下每个个体对温饱冷暖的本能渴求，是文化对身体规训的瓦解，是传统等级秩序压制下文化秩序崩塌的开始。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本应该是承担起国民启蒙的责任，而《阿 Q 正传》将建立在阿 Q 个人肉身欲望之中的意识复

①〔日〕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刘光宇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年，第 348 页。

② 鲁迅：《阿 Q 正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531 页。

苏和觉醒与文明演进结合起来，这正是鲁迅“向下超越”思想在文本的具象表达。直到阿Q生命终结“‘救命，……’然而阿Q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①]，肉身的彻底消亡代表着旧时代底层悲剧命运和旧文化秩序彻底解体的预言，同时也预示着旧文化在得到彻底埋葬后精神觉醒和文明复苏的契机。

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的创作实践与鲁迅形成了深层的结构呼应，他从个人体验和自我“平民性”特点出发深入体察日本战后精神，他创作的起点在于不可回避的生命事件，即儿子天生的残缺。大江在文本实践中并没有选择抽象升华，而是向下深入痛苦的根源，描写出鸟挣扎、犹豫、颓废的过程，这种个人的创伤被大众反复审视。他也以此为出发点，从广岛平民生存中获得创伤呈现的参考。他在《广岛札记》中写道：“广岛以及那些真正像广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直接从他们身上获得了勇气；反之，我也体验到因自己玻璃箱中的儿子而深藏于心底的神经痛种子和颓废之根使我感到的痛苦。我决心以广岛和这些真正的广岛人为铿刀，来检验一下自己内心的硬度。”[②]大江不将战争以宏大叙事展开，而是让自己个人的经历与广岛痛苦记忆相连接，以日常朴素的方式书写人类共同的苦难。

由此可见，鲁迅与大江在叙事上都坚持向下扎根在个体身体与精神体验中，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不同而各有区别。鲁迅指向集体的觉醒和民族的新生，而大江则实现个体的共生与价值的再生。创伤不再仅仅是文本书写的内容，还成为文化超越的起点。

三、理论的生成：创伤书写的话语模式与交流

创伤书写的第三重路径——生成论，鲁迅依托《阿Q正传》构建起国民性批评话语，大江健三郎创作《个人的体验》搭建个人再生人道主义话语。根植于不同的文化的历史背景，两套创伤书写模式衍化成不同民族创伤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根据鲁迅与大江两人创伤书写的创作手法，梳理不同文明话语的对话与交流。

（一）国民性批判与个体的新生

《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精神胜利法”被理论化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症候，阿Q则被抽象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典型，这也预示着中国国民的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病态心理。小说通过暴露国民的这一病态心理特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性的弱点。在鲁迅所创设的创伤叙事当中，身体与精神是相互照应的，汪晖研究时谈到：“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精神胜利法’上的时候，几乎忘却了鲁迅对于身体的关注，但‘精神胜利法’对应的不正是身体的失败吗？阿Q的失败感首先来自打不过别人，甚至打不过他所瞧不起的王胡和小D，其次来源于他所身受的饥饿、寒冷和无法满足的性欲，最终来源于身体的死亡——‘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身体的视野，‘精神胜利法’事实上是无从被诊断为病态的。”[③]鲁迅创伤书写搭建身心双重折磨—肉体感知复苏—精神幻想破灭—国民集体觉醒的叙事逻辑，强化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对照关系，将肉身欲望、生理痛感视作打破旧秩序、唤

① 同上书，第552页。

②〔日〕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刘光宇译，第4页。

③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醒国民意识的原始动力，完成从个体身体创伤到民族精神改造的理论升华。未被启蒙觉醒之前，阿 Q 内心存有自己所幻想的理想的世界，在经历从精神到身体的磨砺，再由身体到精神的转变，通过身体感觉，也就是欲望本能的苏醒表现对以阿 Q 为代表的一代国民精神的觉醒的殷切期盼，由精神上一步一步对旧秩序的失望到身体感觉的一步一步复活，把个人感觉与精神层面联系在一起，实现了肉体生命向精神意志的超越和提升。《阿 Q 正传》作为中国革命开端时代的寓言，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从而上升到对政治、社会和文明等方面的思考。

与鲁迅文章中对国民的批判的指向不同，大江从个体内在精神出发，搭建的是立足个体经验，面向战后日本民族生存境况的话语体系。首先，大江在塑造鸟的形象的时候并没有把鸟单纯塑造成一个懦弱邪恶的人，而是一个内心极为复杂的善恶共存的个体想象。一方面，他逃避责任、软弱、一事无成，被人生压制住内心的本能欲望，是被战争和生活重压迫害的精神失语者；但另一方面，他内心还存在着善良共情的本质和不屈的内心，这份良知也是他最后解决精神危机、实现精神转变的关键所在。创伤不会完全摧毁人性，人的精神意志永远都存在再生的可能。“ 鸟 ”这一代号隐喻着主人公内心被困现实牢笼的现状，但也作为一种孩子气的外号隐喻这主人公对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渴望。小说的结尾讲到主人公主动接纳残疾儿子，直面生活挫折，已和“ 鸟 ”这个称号不相称，也就说明了鸟摆脱了内心困境，通过与残疾儿共生，寻找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点，从迷茫逃离困顿的状态解离出来，承担生命自主性，实现个人的再生。鸟在经历身体和心灵的炼狱后最终敢于直面人生的困惑，在人生的波浪当中建构起了应对人生各种困境的自主性，大江《个人的体验》一书最终以圆满结局收尾，体现的不仅是他对于人道主义“ 个人和社会的再生 ”这一主题上的探究，也是他对于民族未来发展的思索。创伤既然无法永久消除，但人类永远拥有重建生活、获得新生的力量。

（二）跨文明对话：大江健三郎对鲁迅作品精神的继承与交流

虽然两名作家处于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文化记忆，但大江健三郎多次坦言他的个人经历和文学成长道路都深受鲁迅精神的熏陶，莫言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对大江如是评价：“ 他继承了鲁迅的‘ 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的牺牲精神和‘ 救救孩子 ’的大慈大悲。”二者创伤书写存在深层的精神关联，又依托不同的民族记忆，构成差异化的跨文明交流。

鲁迅与大江虽然不在同一个时代，但鲁迅的作品却始终影响着大江的文学创作。首先体现在其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上，从鲁迅的作品中，大江感受到人生与底层社会的百态，看见知识分子与底层百姓的挣扎，因此他在后续文学创作时不仅注意到作品的审美，更承担起回应社会问题的使命。“ 在少年时期的大江内心留下强烈共鸣并引其深入思考的鲁迅小说，也在大学时期的大江学习创作的起始点上，为他显现了前行的光亮。当然，来自鲁迅的这束光亮，在大江其后的创作道路上也一直在不停地闪耀，为他认识社会和人性提示了独特的参照…… ”[①] 鲁迅认识绝望反抗绝望的意识给予大江前行的反抗力量，于大江而言，文学创作应该是在认识痛苦之后面对和承担的过程，因此与阿 Q 停留在觉醒的前夕不同，鸟在困顿之后选择承担无法改变的生命事实。

大江与鲁迅的精神共鸣也建立在相似的孤独

① 许金龙：《“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9 年第 11 期。

体验上，由于个人不被认可的民族身份、日本“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大江长期感受到与主流社会存在隔阂和距离，在鲁迅的作品中，他体会到关于鲁迅书写的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对自我价值的体认，在这层意义上，大江健三郎重新在反思中体味孤独、保持主体性并应用到作品当中。在人物塑造方面，鲁迅和大江均倾向于选择具有边缘特质的小人物作为中心进行描写，甚至会是达到荒诞异质的人物形象，以此达到核心思想内容。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处于社会关系的边缘位置，因此饱受身体创伤、心理压力以及社会身份认同危机等困境，但他们又是矛盾复杂的结合体，这些人物所经受的痛苦指向绝望，但又会在绝望中孕育超越的力量。阿 Q 和鸟都属于社会边缘位置不起眼的人物，他们在社会与生活的冲突中受到创伤，阿 Q 面对的是身份压迫和文化束缚，鸟面对的是现代社会中关于孤独、责任的课题，经历逃避现实后最终在创伤中完整自我疗愈，选择承担责任，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这是对鲁迅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总而言之，《阿 Q 正传》和《个人的体验》之间形成了一种跨时空的文学对话。鲁迅通过阿 Q 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人身心的塑造以及国民性启蒙等问题，而大江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延续关注，将目光转向现代人孤独与疗愈的现状。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对大江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文学价值的追求当中，以文学揭露现实，同时又为处于困境和社会创伤中的人保留觉醒与希望的可能。

结语

创伤不仅是《阿 Q 正传》和《个人的体验》的叙事内容，也是两位作家观察时代、反思社会以及探索普通人类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鲁迅和大江健三郎将个体创伤经历置于民族和时代背景之下，将个体创伤成为反映集体文化创伤与时代困境的重要入口。

从创伤反映论层面，《阿 Q 正传》和《个人的体验》均从身体经验出发，展现出人物从肉体损伤逐渐走向精神消耗的过程。阿 Q 身体的伤害、感知的退化以及精神幻想映照出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压迫；鸟则面对的是战后社会与家庭责任压力下的感知麻痹和精神崩溃。二者面对创伤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但都体现出个体在复杂时代下命运的缥缈。从创伤方法论层面，鲁迅借助反讽性叙事，将阿 Q 身上存在的矛盾展现出来，在荒诞叙事与悲剧内核的交织中完成了对国民精神启蒙的揭示；大江则以自传形式将个人痛苦经验与日本社会集体创伤联系一起。二者在展示创伤的同时，也在创伤叙述中寻找个人精神与民族文化超越的起点。从创伤话语生成论来看，《阿 Q 正传》最终指向对国民精神的批判与对民族觉醒的期待，《个人的体验》则更关注个体在经受创伤折磨后重建自我的过程。二者虽然采取不同的话语模式，但都体现出在黑暗中寻找未来希望与光明的可能。

鲁迅与大江健三郎之间存在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学精神的传承。大江在文学创作的历程中受到鲁迅精神的影响，体现在《个人的体验》中是关注平民生活、反思社会现实，通过书写边缘小人物的孤独、痛苦与挣扎，揭示人在时代难题下的精神困境，但又在绝望过后寻找觉醒与超越的可能。因此，《阿 Q 正传》与《个人的体验》在创伤书写层面形成对话，书写创伤并非停留在展现伤口本身，而是在揭示伤痛过后，在战斗中寻找希望，找到理想和现实的平衡点，找回应对人生的自主权，走出一条与现实和解的自我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 大江健三郎 . 个人的体验 [M]. 王中忱，译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95.

[2] 大江健三郎 . 广岛札记 [M]. 刘光宇，译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95.

[3] 鲁迅 . 鲁迅全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5.

[4] 仲密（周作人）. 阿 Q 正传 [N]. 晨报副刊 , 1922-03-19 (1).

[5] 汪晖 . 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 [J]. 现代中文学刊 , 2011 (3).

[6] 赵京华 . “ 向下超越 ” 与 “ 沉入于国民中 ” ： 对中日学者的鲁迅思想特征论的再思考 [J]. 名作欣赏 , 2023 (13).

[7] 杨伟，张雅蒙 . 论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的广岛记忆与时代性 [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2).

[8] 倪琦 . 鲁迅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研究 [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 2020.

[9] 刘苏曼 . 名为 “ 共生 ” 的监禁状态：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再解读 [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21 (5).

[10] 赵淑琴 .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战争创伤叙事研究 [D]. 吉首：吉首大学 , 2023.

[11] 汪一帆 . 普遍人性论的迷失：也论汪晖《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J]. 美与时代 (下), 2023 (8).

[12] 张伯存 . 鲁迅小说《阿 Q 正传》再解读 [J]. 东岳论丛 , 2024 (1).

作者简介：

刘婉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教于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文化。

潘泳雯，暨南大学文学院 2025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